論「中日國力逆轉症候群」

林泉忠

中國與日本是東亞區域的兩大國家。由古至今，東亞國際秩序的變遷，相當程度受到中日兩國國力的消長所左右。在近代以前長達兩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中，東亞區域形成了以中國為中心的「中華世界體系」，中國的文化軟實力通過該體系影響整個東亞包括日本，「漢字文化圈」及「儒家文化圈」儼然成形。

然而，隨着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崛起，中日兩國國力首度發生逆轉，日本於十九世紀末取代中國成為東亞新霸主，一定程度主宰了東亞區域的命運，其後百年堪稱「日本世紀」，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仍然憑藉其經濟力量、科技和文化軟實力，繼續影響東亞乃至世界。

經歷了1980年代改革開放後的經濟起飛，中國於二十一世紀初重新崛起，中日兩國國力再度發生歷史性消長乃至逆轉。在此過渡期，兩國關係或因歷史問題，或因領土問題而跌宕起伏、衝突不斷，並延續至今。儘管今年為中日關係正常化五十周年，卻未有任何迹象顯示兩國領導人將會互訪，兩國關係的冰冷程度，可見一斑。

本文提出「中日國力逆轉症候群」分析概念①，以解釋中國與日本之間在第二次國力消長乃至逆轉過渡期的二十一世紀初，此起彼伏的諸多衝突現象。筆者曾於2004年提出「邊陲東亞」的概念，通過東亞傳統的「中心—邊陲」關係在近現代的變遷，探討沖繩、台灣、香港在戰後所分別呈現的「去邊陲化」現象②。其中論及的一個重點，是中國國力在近代的衰弱以及日本於明治維新後成功崛起，所引發東亞區域「中心更替」的效應。「中日國力逆轉症候群」概念的提出即是在對此現象關注的基礎上沉澱而成的。

作為「中日國力逆轉症候群」概念的主要論點，本文指出中日兩國社會都存在急需克服的心理調適等因「國力逆轉」而引發的問題，必須認真看待東亞區域秩序的變遷與重構。

一　從世界史看「大國崛起」與「中心更替」

在分析中國與日本因國力發生二度逆轉而引發新舊「中心」之間的摩擦乃至衝突，以及導致東亞區域發生「中心更替」現象之前，本節先從世界史的視角來理解歷史上新興大國的崛起究竟如何帶來區域乃至世界秩序的變遷，包括是否必然導致新舊「中心」之間的激烈爭鬥乃至戰爭，從而進一步掌握仍是現在進行式的中日第二次國力逆轉的過程所呈現的特徵及其影響。

回顧人類所經歷過的世界歷史，因大國的興衰而引發新舊霸權之間的鬥爭並觸發區域秩序變動的例子不勝枚舉③。僅以歐洲十五世紀中葉開啟的「大航海時代」(Age of Discovery) 之後的歷史為例④，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法國、英國等歐洲帝國先後崛起，殖民主義浪潮席捲全球，亞洲、非洲、美洲等地區紛紛淪為歐洲國家的殖民地，導致各區域的秩序面貌發生蛻變。時至十九世紀，大英帝國開始獨領風騷，並在工業革命成功後正式邁向獨霸天下的道路，再次改寫了世界地圖。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迅速崛起，並逐步取代英國成為新的世界強權。經歷了二戰期間同盟國的領軍地位及美蘇兩大陣營對壘的冷戰時代後⑤，美國繼續單獨稱霸世界，影響力波及其在二戰後構築的亞太戰略所涵蓋的東亞區域。

誠然，歐洲一個個大國先後崛起的過程，其實就是世界「中心更替」或「霸權更替」不斷重複的過程⑥。新舊霸權之間，從爭奪貿易利益到競逐擴展海外「種植業」，再到互相搶奪殖民地，成為歐美列強「中心更替」模式的既定內涵。而最終決定霸權更替的，往往是透過新舊帝國之間的武力衝突乃至戰爭的結果。一戰正是新興德意志帝國挑戰大英帝國等列強的顯例。

然而，值得指出的是，一戰後美國與英國在世界範圍所發生的「中心更替」卻得以平穩過渡，並且延續至二戰後，迄今已長達一個世紀之久⑦。「中心更替」如何避免惡性爭奪、避免導致生靈塗炭的戰爭，即新的「中心」如何能「和平崛起」，是國際政治學無可迴避且值得進一步探討與研究的課題。毋庸置疑，探索此課題之意義，對研究東亞區域秩序變遷而言，其重要性不言自明。

二　中日首度「國力逆轉」與東亞首次「中心更替」

當古代歐洲仍然長期處於混沌的時期，東亞區域早在東漢時期就已形成了以中國皇帝為中心、高度制度化的區域秩序——「華夷秩序」。美國哈佛大學漢學家費正清 (John K. Fairbank) 將之稱為“Chinese World Order”，台灣學者張啟雄則使用該詞的中文翻譯「中華世界秩序」；筆者由1980年代以來現代國際關係學的新語境出發，改稱為「中華世界體系」⑧。中國古代的文化

軟實力通過該體系影響整個東亞，「漢字文化圈」及「儒家文化圈」儼然成形。該文化圈涵蓋曾經乃至現在仍長期使用漢字或漢語的國家或地區，除了大中華地區（兩岸四地），還包括日本列島（含沖繩〔琉球〕）、朝鮮半島、越南等地⑨。

然而，君臨東亞超過兩千年的中國在十九世紀中葉後逐漸衰弱，同時日本在明治維新後成功崛起，兩國國力發生明顯消長，日本終於在1894至1895年的甲午戰爭後名正言順地取代中國，成為東亞的新霸主。這是東亞區域史上首次因「國力逆轉」而發生「中心更替」的現象。

此後的一百年間，在某種意義上堪稱「日本世紀」。其間以1945年為界，前後分兩個主要時期。二戰之前，日本以強大的軍事力量，先後併吞琉球（1879）、獲取台灣（1895）、合併朝鮮（1910）、掌控「滿洲」（中國東北，1931）、全面侵華（1937）、佔據香港（1941）、征服中南半島北部（1940）和南部（1941）、東南亞島嶼局部（1942），幾乎佔領了整個東亞及東南亞區域，並試圖建立以日本為中心的新區域秩序——「大東亞共榮圈」⑩。

1945年戰敗後，日本更換和平跑道，以經濟力量繼續維持「亞洲一哥」的地位。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Ezra F. Vogel）於1979年提出「日本第一」的概念來分析戰後日本經濟高度發展的原因，由此「日本第一」成為日本經濟奇迹的代名詞⑪。日本不僅在1960年代後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也是七國集團（G7）中唯一的亞洲成員國⑫。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在1971年取代中華民國成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但對反共色彩濃厚的東南亞國家聯盟（ASEAN）的影響力較弱，而日本跨國企業則早在1960年代就已大舉進軍東南亞市場，其後追求國家迅速發展的馬來西亞更積極推動向日本學習的「東望政策」（Look East Policy）⑬。簡言之，日本憑藉其在經濟力量，科技、流行文化等領域的優勢，以及龐大的政府開發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⑭，至少到二十世紀末仍在東南亞繼續維持着極具影響力的「亞洲一哥」地位。

而中國則在1990年代後才開始在東南亞發揮較為顯著的影響，事實上中國直至1990年才與新加坡建立外交關係，也是在同年與印尼關係正常化。不過，即使在冷戰時代，與蘇聯訣別後的中國因地緣政治因素，以及作為東亞地區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在鄰近的社會主義陣營（包括朝鮮、印支半島）仍然發揮着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特別需要強調的是，冷戰時期還有一個非亞洲國家儼然扮演着「中心」的角色——美國。一方面，美國是日本與韓國最重要的軍事同盟國；另一方面，美國也在反共的東南亞區域或建立軍事同盟關係，或維持軍事合作關係。不止於此，美國在冷戰時期還在經濟上大量援助東亞及東南亞的「自由地區」⑮。簡言之，建構於冷戰時期的美國亞太戰略，使美國在二戰後尤其在軍事安全領域成為該區域不可替代的「影武者」。

三　中國崛起與中日第二次「國力逆轉」

二十世紀末東亞區域中日美「三強鼎立」的時代，隨着冷戰結束及中國推行改革開放政策的成效而快速發生變化，中日之間國力消長的趨勢與日俱增。1978年末，中國結束了意識形態掛帥的毛澤東時代，開始積極推動改革開放政策，使社會經濟迅速發展。到了1990年代中葉，中國國力的全面增強開始受到世界範圍的廣泛關注，進入二十一世紀後「中國崛起」更是呼之欲出。

在中國崛起初期，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陸續趕超七國集團。首先，中國GDP於1995年超越加拿大，躍居世界第七；2000年則趕超意大利；2005年甩開法國，晉升第五；到了2006、2007年則超越作為歐洲經濟大國的英國和德國，名列第三。經過二十一世紀的前十年，中國終於在2010年將作為亞洲最大經濟體長達一個世紀以上的日本的GDP總量擠了下去，躍升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⑯。該年日本GDP為5.39萬億美元，而中國則為5.75萬億美元，到了2021年日本GDP停留在5.39萬億美元，而中國則暴漲至17.73萬億美元，超過日本三倍。軍費預算方面，2021年日本軍費為517億美元，中國則為2,091.73億美元，幾乎是日本的四倍。

正當中國經濟迎來飛躍期，國力亦隨之迅速膨脹之際，日本卻進入被稱為「失落二十年」的暗淡時代⑰。所謂「失落二十年」，是指從1990年代初「泡沫經濟」崩潰開始，日本經濟經歷了長期低迷的時期。在此過程中，舊有的經濟政策乃至體制無法帶動日本持續增長，而人口老齡化與少子化等社會問題日趨嚴重，年金改革困難重重。處於這個時期的日本年輕世代看不到希望，普遍出現了與1980年代之前的日本經濟高增長時期「向上看」、「向前看」、「向

所謂「失落二十年」，是指從1990年代初「泡沫經濟」崩潰開始，日本經濟經歷了長期低迷的時期。（資料圖片）

外看」相反的「向下看」、「向後看」、「向內看」現象⑱。而日本在安倍晉三第二度主政(2012-2020)之前六年先後換了六位首相，加深了日本社會對政府的不信任⑲。除此之外，2011年日本東北地區空前的大地震、大海嘯，也進一步加深了日本社會對經濟前景乃至國力不繼的深重憂慮。

換言之，經歷了整整一百年的「日本世紀」之後，曾經的「中心」——中國在二十一世紀初以崛起之姿，展示了重新問鼎「亞洲一哥」地位的氣勢。然而必須指出的是，在此東亞區域內部力量面臨鉅變的過程中，中日兩國之間的關係極不穩定。事實上，進入二十一世紀後中國發生的三次大規模遊行都是針對日本而發，即2005年因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屢次參拜供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等「歷史(認識)問題」、2010年中日釣魚台海域「撞船事件」，以及2012年因日本欲將釣魚台「國有化」而發生的大規模「反日運動」。

本文所提出的「中日國力逆轉症候群」，作為分析二十一世紀初中日關係以及東亞秩序變遷的學術概念，正是基於二十一世紀前二十年兩國關係跌宕起伏、衝突不斷的現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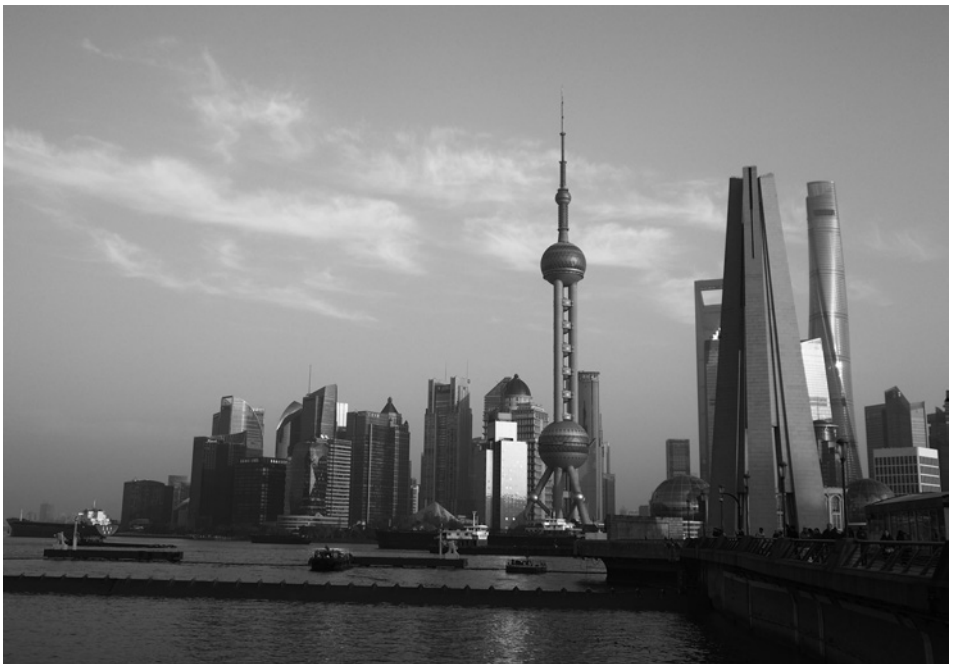
四 「國力逆轉」下中日社會的調適問題

「中日國力逆轉症候群」概念的最主要論點，在於指出中國與日本進入國力消長乃至逆轉的過渡期，之所以發生此起彼伏的衝突，係由於中日之間各自存在心理調適的問題。

一方面，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使中國的社會與人民都來不及做好準備，國家還在摸索如何成為受世界敬重的責任大國，而大國國民風範也一時未能在中國社會建立起來，相反的行為卻在震撼世界的2012年反日運動中表露無遺。另一方面，在二戰後穩坐「亞洲一哥」地位已久、早已聽慣了「日本第一」的日本社會卻也未做好淪為亞洲「老二」的心理準備，因此無論是媒體輿論界還是思想學術界，迄今幾乎仍未有承認中日國力已發生逆轉以及關於「老二」新定位的相關討論。

正因為中日雙方彼此對國力逆轉的不適應，使民族情緒在不安的過渡期中容易被潛藏經年的一些問題所激發，以致發展成高危的衝突，甚至陷入難以收拾的境地。換言之，中日兩國的民族主義在此不穩定的過程中獲得了迅速滋長、日趨高漲的環境。

在中國，「中國崛起」提升了中國人民的民族自豪感，使他們在面對挑戰自身民族尊嚴的外來壓力時，有了更敏銳的反應⑳。1996年的話題之作《中國可以說不——冷戰後時代的政治與情感抉擇》、2008年的《中國不高興》㉑，以及2017年的電影《戰狼II》所代表的象徵意義，正是崛起三十年來兩代中國人持續對民族主義的熱情呼喚。



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使中國的社會與人民都來不及做好準備。（資料圖片）

眾所周知，民族主義的能量需要借助「假想敵」來凝聚。1930年代日本侵華期間「皇軍」在中國的惡行所沉澱下來的國仇家恨等歷史記憶，使日本成為中國民族主義的最大「假想敵」。上述中國爆發的三次大規模「愛國遊行」，均為針對日本而發。值得指出的是，在中國民族主義高漲的背景中，既有來自日本右傾化現象刺激的外在因素，亦有涉及中國國內治理體制、愛國主義教育、社會變遷等內在因素，致使民族主義長時間處於亢奮狀態，一有風吹草動，就容易走向失控的臨界點。

在日本，經歷了「失落二十年」，二十一世紀初國民逐漸失去對國家前途的信心，使高舉民族主義旗幟的保守乃至右翼勢力獲得更多着力的空間。隨着反對「自虐史觀」的「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於1996年成立㉒，日本社會中的右翼主張在1990年代中葉以降快速擴展，不僅在社會得以蔓延，更滲透至政壇。書店裏「反中」、「嫌韓」的書籍泛濫，右翼思想更透過網絡媒體如「第二頻道」等佔據一定的輿論陣地㉓。2006年安倍內閣以及翌年麻生太郎內閣的誕生，象徵着右翼思想已成功奪取政治領域的高地，而2012年12月安倍再度出任首相，則彰顯日本政治與社會的右傾化達到二戰結束以來的頂峰㉔。

2012年是中日關係正常化四十周年，該年發生的圍繞釣魚台爭議的衝突所折射的，正是在中日雙方國力發生明顯消長的過渡期，由於兩國政府與社會都未做好適應的準備，因此讓迅速高漲的民族主義得以高度介入，最終導致兩國關係陷於頻臨戰爭的動盪時期。

衝突爆發兩年後，2014年11月，中日雙方就處理與改善兩國關係達成四項原則共識：一、雙方確認將遵守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的各項原則和精神，繼

續發展中日戰略互惠關係；二、雙方本着「正視歷史、面向未來」的精神，就克服影響兩國關係的政治障礙達成一些共識；三、雙方認識到圍繞釣魚台等東海海域近年來出現的緊張局勢存在不同主張，同意通過對話磋商防止局勢惡化，建立危機管控機制，避免發生不測事態；四、雙方同意利用各種多雙邊渠道逐步重啟政治、外交和安全對話，努力構建政治互信。中日之間的所謂四個政治文件，包括1972年的《中日聯合聲明》、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1998年的《中日聯合宣言》和2008年的《中日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聲明》。

然而，中日關係並沒有因為2014年雙方達成的共識而真正回歸正常，直到2017年安倍政府對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有較正面的回應之後，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於2018年5月訪日，中方始定位兩國關係「重回正軌」。不過，好景不長，隨着特朗普（Donald J. Trump）政府中後期中美對立態勢的出現及長期化，中日關係迄今仍未呈現真正的改善趨勢㉕。

五　代結論：中國與日本的抉擇

2022年中日迎來關係正常化五十周年，儘管是兩國邦交的重要年份，中日雙方領導人卻未有互訪的任何迹象，折射出中日關係的冰冷程度。誠然，造就二十一世紀初期（包括現階段）極不穩定乃至跌宕起伏的中日關係的因素頗多，譬如2018年以降中美進入「新冷戰」國際格局的影響，筆者以為從結構上尋求化解中日衝突的關鍵，仍在於雙方都應認真看待現在進行式的「國力逆轉」與東亞區域「中心更替」的現實所帶來的兩國社會民眾心理調適的問題。

一方面，中國曾經在近代以前，以「中華世界體系」構築起長達二千多年東亞歷史上相對和平穩定的區域秩序。在經歷了強調「主權」與「平等」等觀念的現代性洗禮之後，昔日「中華世界體系」誠然已不適用於作為構築二十一世紀東亞新區域秩序的框架。然而，這個體系所吸納的先賢孔子在處理與周邊地區關係時倡議的「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論語．季氏第十六》）的宏大精神，以及五十國學子、商旅雲集長安所展現的「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盛唐風範㉖，仍值得二十一世紀重返東亞「老大」地位的中國社會虛心重溫與借鑒㉗。

另一方面，從「亞洲一哥」可能淪為「老二」的日本如何選擇未來的道路，亦為無可避免的課題。遺憾的是，日本政界與文化思想界至今仍未掀起觸及社會靈魂的、以「日本何去何從」為命題的相關討論。於2009年主政不足一年的鳩山由紀夫曾積極倡議「東亞共同體」㉘，不過卻因日本對崛起的中國的不信任以及中日韓三方之間涉及歷史問題與基於國家利益考量的芥蒂而未能獲得進一步發展。面對習近平時代奉行「實力主義」外交路線的中國，日本歷屆

政府與主要政黨更傾向強化美日安保來尋求維持自身在印太區域的地位。儘管2012年再度執政的安倍較有國際戰略，然而其積極構築的卻是強化西南諸島的防衛，以及熱心拉攏價值觀相同的國家，形成「自由與繁榮之弧」㉙，並藉此圍堵中國，缺乏對重構亞洲未來和平秩序更具遠大理想的積極思維。

本文開首已論述了世界史上多個「中心更替」的例子，其中大多在更替過程中發生衝突乃至爆發戰爭，然而也有「和平轉移」的案例。二十世紀初期，大英帝國仍然統治着大半個世界，新興的德意志帝國卻不甘示弱，嘗試挑戰其地位，儘管也曾強盛一時，最終仍以失敗收場。另一個例子則是二戰後的英國，作出與德國截然不同的抉擇。美國於一戰後迅速崛起，並於二戰後名正言順地取代英國成為世界的新霸主，然而英國所展示的，卻是積極面對淪為「老二」的現實，並心甘情願與美國精誠合作的姿態。

面對東亞區域第二度歷史性「國力逆轉」的態勢，中國將如何展示負責任的大國形象，同時樹立起受世人肅然起敬的國民風範？而日本又將如何作出抉擇，究竟是仿效1945年以前試圖挑戰英國的德國，走向與中國對抗的道路，還是仿效戰後面對崛起之美國的英國，與中國攜手共同開創東亞區域的共贏新時代，抑或尋求第三條路㉚？

毋庸置疑，第二度歷史性「國力逆轉」時期的中日兩國如何應對和抉擇，勢必影響東亞區域秩序乃至世界秩序的安定。作為東亞兩大國的中國與日本將會作出如何的應對與抉擇，我們拭目以待。

註釋

① 筆者於2012年釣魚台列嶼衝突爆發之際，首次提出「中日國力逆轉症候群」的概念，參見林泉忠：〈中日國力逆轉症候群〉，《中國時報》，2012年8月21日，A12版；其後亦運用此概念來分析釣魚台問題與中日關係的變遷，參見林泉忠：〈國力逆轉下的中日大衝突——解讀釣魚台風暴的來龍去脈〉，《明報月刊》，2012年10月號，頁40-43。

② 林泉忠：〈「邊境東アジア」——新たな地域概念の構築〉，《國際政治》，第135號（2004年3月），頁133-52；〈二十一世紀台灣國族認同啟示錄〉，《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20年2月號，頁21。

③ 有關世界新興大國的崛起所伴隨的「中心」或霸權的更替，以及對世界歷史與國際秩序的影響，參見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aul M.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④ 「大航海時代」又稱「地理大發現」，從十五世紀初一直延續至十七世紀中葉，是歐洲開拓海外航路、尋求海外貿易夥伴的重要時期，由葡萄牙與西班牙所主導。「大航海時代」對國際秩序的影響，主要在於帶動了歐洲開拓海外殖民地以及其後引發的爭奪殖民地熱潮。

⑤ 1950年代美蘇兩大陣營亦於東亞形成兩大對壘態勢，即美國與日本、韓國、台灣、菲律賓；蘇聯與中國、朝鮮、部分原法屬印支地區包括北越等。

⑥ 有關「中心更替」對周邊/邊陲的影響，參見林泉忠：《「邊境東アジア」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ポリティクス——沖縄・台灣・香港》（東京：明石書店，2005）。

⑦ 美國哈佛大學國際政治者納伊在研究勢力均衡議題時，也傾向認為大國崛起並非必然引發新舊「中心」或霸權之間的戰爭。他舉例指出1895年美國與英國就南美洲的邊界問題發生爭執，卻未爆發所謂的「美英戰爭」。參見Joseph S. Nye,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History*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3), 64。

⑧ 「華夷秩序」的本質是前近代東亞地區長期存在的一種世界體系。參見John K. Fairbank, "A Preliminary Framework", in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ed. John K. Fairbank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1-20；張啟雄：〈論清朝中國重建琉球王國的興滅繼絕觀——中華世界秩序原理之一〉，載歷史關係國際學術會議實行委員會編：《第二回琉中歷史關係國際學術會議報告・琉中歷史關係論文集》（那霸：琉中歷史關係國際學術會議實行委員會，1989），頁495-520；林泉忠：〈「邊境東アジア」〉，頁133-52。

⑨ 就「漢字」與「儒家」（儒教）兩個概念賦予「文化圈」意涵的用法，始於日本歷史學者西嶋定生提出的「東亞（東洋）世界論（冊封體制論）」，意指在歷史上深受中國漢文化影響的地區。參見村田雄二郎、C. ラマール（Christine Lamarre）編：《漢字圈の近代——ことばと國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5）。

⑩ 近年對「大東亞共榮圈」的研究，參見河西晃祐：《帝國日本の擴張と崩壞：「大東亞共榮圈」への歷史的展開》（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2012）。

⑪ 傅高義高度評價日本的經營能力，成為學界重新評價日本特有的經濟與社會制度的契機。參見Ezra F. Vogel, *Japan as Number One: Lessons for Americ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⑫ G7成立於1976年，其前身是G6，1997年因俄羅斯的加入而更名為G8；日本早在G6階段已是成員國。

⑬ 「東望政策」始於1981年就任馬來西亞第四任首相的馬哈迪（Mahathir bin Mohamad）於同年12月宣布推動一項向日本學習的政策。參見黃以樂：〈「東望政策」2.0：馬哈迪籲大馬學習日本價值觀和工作態度〉（2018年6月14日），關鍵評論網，www.thenewslens.com/article/97811。

⑭ 日本的政府開發援助（ODA）始於1954年，針對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亞洲鄰國。從1954至2021年，日本累計支出ODA金額達5,505億美元，其中日元貸款約2,500億、贈與資金約1,200億、技術援助約700億，提供國際組織累計約1,100億。參見外務省國際協力局：〈政府開發援助（ODA）Q & A集〉（2021年9月），www.mofa.go.jp/mofaj/gaiko/oda/files/100205666.pdf，頁7。

⑮ 冷戰時期美國對戰爭破壞後的西歐各國進行經濟援助、協助重建的計劃，稱為「馬歇爾計劃」（The Marshall Plan），官方名稱則為「歐洲復興計劃」（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除了歐洲，美國的經濟援助也在韓戰後的亞洲第一島鏈地區實施，範圍包括日本、韓國、台灣、菲律賓、新加坡等，不過並未納入「馬歇爾計劃」。

⑯ 多數趨勢分析均指出中國的名目經濟規模有可能於2030年前後超越美國。若以購買力平價GDP來估算，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早已宣布中國的經濟規模於2014年已經超過美國。參見周濟：〈中國GDP何時超越美國？〉，《哈佛商業評論》，2021年3月號，www.hbrtaiwan.com/article/20200/china-gdp-surpass-the-united-states。

⑰ 最早出現「失落二十年」（「失われた20年」）的表述，參見朝日新聞「變轉經濟」取材班編：《失われた〈20年〉》（東京：岩波書店，2009）。較早論述「失落二十年」期間日本經濟狀況的分析，參見深尾京司：《「失われた20年」と日

本經濟——構造的原因と再生への原動力の解明》(東京：日本經濟新聞出版，2012)。

⑱ 此亦為筆者於安倍晉三第二度上台之前，在日本大學任教時所目睹的日本大學生普遍的精神面貌。參見林泉忠：〈何謂「安倍時代」? ——跨越平成與令和的光與暗〉，《明報月刊》，2020年10月號，頁89-91。

⑲ 根據安倍晉三第二度主政前六年之經驗，當內閣支持度跌至三成，政權穩定性就會亮起紅燈，而當跌破三成，政權就難以繼續維持。參見林泉忠：〈「安倍時代」——一個日本久違了的偉大時代〉，《明報》，2020年8月31日，B10版。

⑳ 不過，「中國崛起」並未帶來華人世界的「四海歸心」，甚至產生香港社會與台灣社會對北京更強的離心力。有關從中國的制度面來探討中國崛起所引發對周邊乃至世界的影響，以及香港與台灣作為觀察中國崛起態勢的有效性，參見林泉忠：〈「中國台頭症候群」——香港・台灣から見た「チャイニーズ・システム」の課題〉，《アジア研究》，第63卷第1號(2017年1月)，頁48-67。

㉑ 宋強等：《中國可以説不——冷戰後時代的政治與情感抉擇》(北京：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1996)與宋曉軍等：《中國不高興》(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成為1990至2000年代最受國際社會關注的中國書籍。

㉒ 「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成立於1996年12月，是由持右翼史觀的部分文化及學術界人士所成立的機構，以編纂「右翼教科書」、宣傳右翼史觀為己任，創會初期的主要召集人包括西尾幹二、藤岡信勝等學者。

㉓ 「第二頻道」(2channel／2ちやんねる)是日本最大型的網絡論壇，於1999年5月開始營運。根據尼爾森公司(Nielsen Co., Ltd.)調查統計，該論壇2007年平均每日發帖數超過250萬，至2009年已擁有超過1,170萬用戶。

㉔ 對安倍晉三右翼思想的分析，參見林泉忠：〈解析安倍晉三的「右翼指數」〉，曾刊於《亞洲時報(在線)》，2006年9月25日；〈安倍晉三的「右翼」險棋〉，《中國報道》，2013年第2期，頁50-51。

㉕ 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發，因日本捐贈部分物資支持武漢抗疫，中國社會呈現一片謳歌中日友好，沉浸在「山川異域，風月同天」的「疑似蜜月期」氛圍。然而，筆者根據對中日關係環境變化的徵兆及結構性矛盾的複合觀察，率先提出「中熱日冷」的警示。參見林泉忠：〈疫情下的「中日友好」能持續多久？〉，《明報》，2020年2月17日，B06版。

㉖ 盛唐時期，周邊藩屬紛紛來朝，包括日本遣唐使在內的留學生、留學僧蜂擁而至，並由中國提供學費、住宿。優秀的留學生也不乏受大唐朝廷錄用者。官至鎮南都護、安南節度使(正三品)、潞州大都督(從二品)的阿倍仲麻呂(698-770)即為表表者。

㉗ 鄧小平時代中國的外交路線以「韜光養晦」為圭臬，習近平時代則較強調「有所作為」，傾向以「實力主義」處理「三海」(東海、台海、南海)爭議等問題。

㉘ 鳩山由紀夫：〈私の政治哲学〉，*Voice*，2009年9月號， 頁132-41；Yukio Hatoyama, "A New Path for Japan", *The New York Times*, 26 August 2009, www.nytimes.com/2009/08/27/opinion/27iht-edhatoyama.html。

㉙ 所謂「自由與繁榮之弧」是指從東南亞經由中亞到中歐及東歐，連成一條弧線包圍着歐亞大陸，支持與日本價值觀相同的國家，被廣泛解讀為「圍堵中國」的政策。

㉚ 筆者曾分析鳩山由紀夫倡議的「東亞共同體」為東亞「中心更替」時期日本牽制中國的第三個選擇，參見林泉忠：〈「歸亞脱美」——日本民主黨時代的亞洲戰略〉，《明報月刊》，2009年10月號，頁65-67。

林泉忠 東京大學法學博士，武漢大學日本研究中心教授兼執行主任。